

中国 古代 谚语 词典



中国古代谚语词典

● 何学威 编著

● 湖南出版社

无古虚谚，不可不察也。

——《韩非子·奸劫弑臣第十四》

中国古代谚语词典

何学威 编著

责任编辑：邓家智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7.625

字数：394,000 印数：1—5,000

ISBN 7-5438-0215-5

H·4 定价：8.20元

凡 例

一、本词典共收先秦至清末谚语二千五百余条，其中包括部分与谚语交叉、借用现象比较明显的俗语。

二、本词典主要是为使用而编写的，故采取按内容分类的编排方法，共得十五类，各类又分若干项，总计一百三十四项，每项下分释的谚语又以语见历代古籍的先后为序。本词典也兼具查找的功能，比如我们要找“男大须婚，女大须嫁”这条古代谚语的解释与引文，查“家庭类·婚嫁”项即可得到。

三、每条古代谚语词条下包括注释与引文两大部分。

1. 注释部分：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难懂词语加解释；除少数通俗易懂的谚语以外，较难理解的一般有译文，指出其字面意义及本意，部分有对应的今谚；运用时有两个以上义项的，分别指出不同用法与例证。

2. 引文部分：就目前能搜集到的材料，尽可能指出谚语的最早出处。引文中出现的谚语与所收谚语字面相同，引文前标以“语见”；与所收谚语字面有出入，引文前标以“语本”；内容相同，只个别词语不同的谚语，按见于古籍先后次序排列，以年代最早的作为“正条”，其它则依次列在该条后，标以某“作”，以见其流变。引文除常见古籍仅标明书名篇名、卷数外，一般都注明朝代、书名、篇名、卷数，戏曲注

明折数，小说注明回数，注明作者姓名。个别成书年代、作者姓名不详者，则只注明转引古籍的名称。

四、本辞典前附有《分类细目》索引，便于读者按需查检。

序

在我国古代的许多著述里都记载了当时流行的谚语。现存《周易》中某些卦爻辞，即带有谚语性质。但明确标名为“谚”的，据我所知是始于《左传》和《国语》，如《左传》隐公十一年引“周谚有之：‘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桓公十年引“周谚有之曰：‘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国语·越语》引“谚有之曰：‘觥饮不及壶飧’”。即其例。在以后的典籍中，不断出现新的谚语，特别是宋元以后，由于通俗文学的兴起，更有大量流行的谚语被记载下来。

谚语虽起源很古，但对什么是“谚”，前人的解说却比较含糊。许慎《说文解字》说：“谚，传言也”。段玉裁注：“谚、传叠韵。传言者，古语也。……凡经传所称之谚，无非前代故训，而宋人作注，乃以俗言俗论当之，误矣。”其意盖以前代流传下来的含有某种经验教训之意的言语为“谚”。但以“俗言俗论”为“谚”，并不始于宋人，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已释谚为“俗语也”。同时颜师古为《汉书》作注，也释为“俗所传言也”。从古籍所引谚语的实际来考察，段氏强调谚为“古语”，似并不尽然；而谚语确又与一般的俗语有所区别。我以为韦昭《国语》注云：“谚，俗之善谣也”概括得比较正确。因为谚既是“俗所传言”，不拘今古，但又非一般的俗语，而是对某种社会生活现象或自然现象的一种认识的总

结。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思想倾向、感情兴趣、生活环境和历史条件等的限制，这种总结当然不一定是正确的或善的，甚至是谬误的、反动的。但提出这种总结的人们自己却认为是“善”的，有益的。

如果这样的理解不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古代谚语是用最精炼的语言纪录下来的古人对生活的认识和经验。这种纪录由于是点滴的、分散的，自然不可能把古人的认识和经验完全地反映出来。但是，如果把它们搜集起来，加以归纳整理，那就不仅可以从之了解到古代的风土人情，甚至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面貌也会有所认识。假如再进一步，对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谚语所产生的时代进行考察，则还有助于加深对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中某些问题的认识，例如“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谚语出现在明代，就是理学家企图进一步扼杀反理学思想的发展的一种表现。因此，把散见于古籍中的一些谚语汇集起来，并分类整理，加以注释，编成词典，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何学威同志于六十年代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他在工作之余，长期从事于谚语的搜集和整理，曾出版《中国风土谣谚释》，受到读者的欢迎。在以往积累的基础上，又编著了这部《古代谚语词典》。本书搜罗范围颇广，除利用了前人一些采集谣谚的专书外，还广泛地查阅了各类古籍，包括经、子、史和重要作家专集、小说、戏曲及笔记等，计收入谚语二千五百条左右，较之过去同类的书籍，可以说是洋洋大观了。尤为可贵的是：对这些谚语，他大都力求找出其较早的出处，并作出通俗而准确的注释，既可供研究风俗、文化史的专业工作者的参考，又可供一般读者的涉猎，可谓雅俗共赏。我认

为，这是在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方面的一个新成就。当然，这不是说本书已是尽善尽美了。任何词典一类的书都是不可能没有缺点的，编撰谚语词典，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拓荒的工作。以一人之力来进行，疏忽、遗漏固所难免，选择、诠释的欠妥，也是完全可能的。有些谚语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可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解释的片面或分歧更在所不免。我在读本书的初稿时，曾提过某些意见，学威同志在定稿时都已虚心采纳。但个人的学识有限，且有他事缠身，未能专意，特别是在条目的增删上，未能多留心，疏忽之处必定还是有的。这些，我想，都只有期待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来指正了。

因为我对学威同志编撰此书的过程有所了解，又读过它的初稿，故应学威同志之求，写了上面的话。

马积高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于湖南师范大学

自序

培根说：“一个民族的天才，机智和精神都可以在它的谚语中找到。”这句话我一直奉为谚语研究的主臬。谚语这颗民间文学中璀璨的明珠，曾深埋在太古时代的历史尘埃与古迹之中，然而久经不衰，至今仍生生不息，光彩照人。它在劳动人民的唇舌之上生存，伴随着整个民族的历史繁衍，逐步孕育、形成、发展、成熟，仿佛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因而谚语源远流长，极为丰富，绚丽多姿，溢彩流光。

(一)

谚语，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它先于文字产生，不是用笔写下来的，而是口耳相传开来的。清代杜文澜在他编著的《古谣谚》“凡例”中说：“其始止发乎语言，未著于文字。”是十分正确的。高尔基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这个问题作了更透彻、更清楚、更科学的论述，“语言艺术产生在太古时代人的劳动过程中，这是大家公认和确定的。这种艺术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类渴望用最容易记牢的词形，即用二行诗、‘谚语’、‘俗语’和古代的劳动号子等等的形式来组织劳动经验。”（高尔基《论文学·论艺术》）谚语和其它所有文学艺术形式一样，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我们可以这样说，谚语是古代人民对自己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

所得出的具有经验意味的集体口头创作。

“人们的口头创作，即民间创作，在原始时期是有着广泛发展的。民间创作之最早的形式是关于过去的奇谈，即神话。童话故事也特别发展。民间创作之较晚的形式是歌谣、叙事诗、谜语和谚语。”（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苏联历史学家柯斯文在这段文字中关于原始文艺诸种形式的出现有先后之分的见解是可取的。因为整个原始社会延续百多万年之久，作为近十万年之内的产物——原始形态的文艺，各种形式不会是同时产生的。即以诗歌和谚语比较，作为劳动经验总结的谚语就不可能象最原始的诗歌那样可以作为劳动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产生的，扛木头时发出的“杭育杭育”可以看作诗，但不好视为谚。号子式的反映节奏的诗歌产生在劳动之时，是即兴之作，而经验谈式的谚语是形成在劳动之后，是“痛定思痛”的产物。我以为主知的谚语是由主情的歌谣发展而来的，这中间有个谣谚交融，半谣半谚的过程。谚语一般有韵，音律和谐，句式整齐，我们单从形式看，与歌谣极为相似，因此，前人有这样的说法：“谚，俗之善谣也。”（《国语·越语》韦注）杜文澜在论述了谣谚的区别之后，也说：“然二者皆系韵语，体格不甚悬殊。故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可以彼此互训。”（《古谣谚·凡例》）这并不是古人故意混淆谣谚之间的界限，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看到了谣谚之间确实存在一个互相衔接，彼此交融的阶段。谣谚交融的主要形式是“二行诗”，谚语作为口头文学作品，也是诗，它是科学的诗，哲理的诗，是以诗的文艺形式表达出来的原始科学和哲理，当然其中也不乏原始人朴素真挚的感情。当以抒情为主的诗歌渗进原始科学和哲理色彩，变成以认识作用为主

时，它便可以逐渐摆脱音乐和舞蹈的陪伴，成为比较纯粹、相对独立的谚语这种文学形式出现了。但由于人们不断赋予它的庄严感和权威性，往后，它也常常被引入别的文体（如诗歌、散文等），但要从中辨认出它的形迹来是并不困难的。谚语这种最初有助于改造自然的功利价值以及有助于提高人类本身思想和道德修养的功利价值，既而又有助于人类改造社会的功利价值，是“真、善、美”之“善”，大概也可理解成“俗之善谣”之“善”吧？任何优秀艺术作品都是真善美的统一体，谚语也不例外。而对于它来说三者之中“善”的功利价值更为突出。在谚语还处于童年时代时，它的美感与功利价值的联系却是非常明显的，有时甚至是一种简单、粗糙的直接联系，这是由人类早期美感特点决定的。让我们继续分析、研究一下我国处于谣谚交融阶段的早期谚语吧。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的周易，其中一部份卦爻辞中的韵文，便是民间的谣谚，郭沫若把《周易》称之为“是一座神秘的殿堂。”又说如果“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我们可以看出那是怎样的一个原始人在作裸体跳舞。”（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里对《周易》的看法是引人思索的，然而确定的时间失之过早，应该说是殷商时“一群奴隶们在作裸体跳舞”，这些谣谚韵语映照着奴隶生活的艰辛和喜悦、才能和智慧、诗情和哲理。

这里有总结生产经验的。比如：

拔茅茹，以其汇。（《泰·初九》）

“茹”在这儿作“根相牵连”解释，拔茅（草）为什么要连根呢？因为它的再生繁殖能力特别强。不然，很快又会繁盛（汇：盛也）。这条宝贵的田间管理经验，我们在今天的农

谚中仍能找到它的“后裔”，以资佐证：“拔草连根拔，萌芽永不发。”“锄草不除根，来春又发青。”“除草光锄头，二次出来大报仇。”

还有总结生活经验的，比如：

履霜，坚冰至。（《坤·初六》）

在这个简短的句子里，以凝炼的文字形象地说明事物将变时，初见征兆，变化随即来到。

还有不少谣谚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比如：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大壮·上六》）

一只公羊将角撞在篱笆上，挣又挣不脱，进又进不了。这滑稽的情势比喻着一些人行动疏忽，只顾蛮撞，不看对象，结果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这些充满生活情趣，散发着泥土芬芳的人民口头文学精华竟然出自《周易》这样的古籍，真有点不敢相信以为真。然而“古无虚谚”，前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周易》的编者吸收谣谚的目的在于辨妖祥于谣（有所谓“谣占”），识真伪于谚。至使一些优美的谣谚得以保留，我们真得谢谢我们的祖先。

从上述简要的分析看出：古代谚语是由歌谣衍进而来的，它是原始口头文艺中较晚的一种形式。

（二）

“谚，传言也。”（许慎：《说文解字》）

在民间广泛地流传，这是谚语本身又一个显著的特征。谚语的流布需要固定的范围和传播的机会，这就要求一个前提条件，即人类居住的相对集中和稳定，这只有在村落产生后才有可能。我国古代谚语起源的时间界限，似乎可以以原

始社会村落的形成为标志。定居的村落形成于何时呢？大约在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这个时候，氏族制度已经形成。母系氏族公社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约在距今一万年前，转入了它的全盛时期。这时每个氏族成员都聚居在一起，形成定居的村落。象我国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华阴横阵、宝鸡北首岭、渭南史村、邠县下孟村等，均属这一时期的村落。从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村落规模较大，达五万平方米，房舍分东西南北四群，每群有一、二所大房子和许多小房子，门都朝着中心广场。这个广场便是全氏族成员集合、娱乐、祭祀的公共场所。这种布局充分反映了氏族公社的社会结构，他们在公有的土地上集体劳动，互助协作。他们依靠集体力量，过着平等的原始共产制生活。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经济生活，已经由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狩猎转变为以生产食物为主。从甘肃永靖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来看，当时确已过着定居生活，同时还发现有收割农作物的石刀、石斧等农具，另外还在房子里发现有谷物的残迹，足以说明当时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谷物是当时的主要食物。于是，一些最初的农业生产经验，便从村社老农的口中源源不断地总结并讲述出来。高尔基曾说：“在古代有一个时期，劳动人民的口头艺术创作仍是他们的经验的唯一组织者，他们的思想的形象化的体现者，以及集体劳动力量的鼓舞者。”（高尔基：《论文学·苏联的文学》）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勾勒出这样一幅古代谚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图画：在我国原始氏族村落中，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当“日之夕矣，牛羊下括”之时，劳作了一天的人们也纷纷从野外归来，用过简单的晚餐，便三、五成群来到中心广场，如果

氏族首领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宣布，也无祭祀活动，正值清风徐来，皓月当空，我们的先人便也围着篝火，说说笑笑，也有一部分青年唱唱跳跳，那都还是一些极为原始的音乐与舞蹈。人群之中“摆龙门阵”的中心人物，自然是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为了促使氏族内部经济进一步繁荣，生产和生活安排得更好，于是他们努力传播一些经验，尽可能提出一些预见，都是属于“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一类的讽劝、训诫性的语言。他们使用的是简炼的流行的氏族语言，采取的是诗歌韵语形式，使大家听起来有味，念起来上口，以便记忆、流传。所以，谚语一开始，便带上了文学性和权威性。人们也习惯于凡事“询之老农，验之行事”。通过口耳相传，不断实践，有些屡试不爽，有些得以修正，久而久之，逐步定形，成为氏族内部公有的口头教科书，最早的科学文艺资料。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歌谣》一书中称谣语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正是高度概括了这一过程。以前已经有人注意过村社形式与谚语产生之间的关系，明代江盈科所撰《公余日钞》上说：“村社占年之说，自古有之，如雨旱验生草；如麻麦验雪，往往无爽。有不待求之天文书者。耆旧之在乡井，阅世久，历时多，观化广，见事熟，必有所试而云，言非孟浪也。”（杜文澜：《古谣谚》）在这类“必有所试而云”的谚语中，最早出现的大概还是属于视察天象，占测晴雨寒暖，四季变化的“经验谈”，因为这些直接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农、牧业有关。原始社会里人民的口头创作是很丰富的，谚语也一定不少，可是，因无文字记载，保存下来的却不多。我国何时开始有文字，目前还不能断言，但自甲骨卜辞发现后，证明至迟在殷商后期

(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已有定形文字,后来文字应用渐渐推广,史前时期流传的人民口头创作如诗歌、神话、谚语等,有一部分便被记录下来,使我们能够从大量文物、文献中窥见原始文化的一斑和文学艺术的萌芽。在研究我国古代的谚语时,我们只能凭最早的文字记载来推断了。如当时对于气候的变化,天象的观察更直接的证据是来自殷代具有很多求雨刻文的甲骨上。甲骨上的卜辞并不等于谚语,而甲骨文中确实保留了一部分原始农谚的基本形式。

在殷墟等地出土的甲骨文字,是我们已发现的较早的文字。它是经过长期的孕育发展起来的基本成熟的文字。郭老说:“中国文字,到甲骨文时代,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从夏初到殷墟时代,不过一千年左右,夏初已有文字并运用于文献记录,应当是无可怀疑的。真是“无巧不成书”,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有文字记载的谚语,也正好从称为“夏谚”的开始,例如:

“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孟子·梁惠王篇下》晏子引夏谚)

这是夏朝之时老百姓中流传的谚语,它生动地反映了原始社会解体,走向奴隶制度时代的农事生产活动与奴隶社会的关系。

“游”的原义是旌旗上面的飘带。当时禹王出行,还是打几面旗帜的,到各处走走,了解了解生产情况与民情,所以“春行曰游”,目的是“春省耕而补不足”。“豫”的本义是一个人牵了一头大象,干什么呢?这里是作代步的工具。“秋行曰豫”,目的是“秋省敛而助不给”。禹王到秋天调查了解收割情况,确定农作物征收额时,便是以大象为坐骑。罗振玉

说：“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象，当时不仅作交通工具也当作畜力使用，典籍上还说殷末用象作战。中国原来是出产大象的，后来因气候变化象才南迁印度。河南省本来就称为豫州，乃产象之地。殷墟（河南·安阳）发现过亚化石象，甲骨文中也确有一条捕象的记载：“今夕其雨，获象。”（前三·三一，三）

夏代人民通过这条谚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君王啊，要是春天不来看的话，便不了解我们的劳苦情况，而让我们得到休息；要是秋收时不来视察的话，就不知歉收的情况而减免赋敛，给以赈济。实际上在禹的时代，这种“不游不豫”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但自从夏启继位以来，变为家天下，这些优良传统逐一被丢掉了，老百姓怀着对先王的无限想往，要求现在的统治者学习禹王一年一度的春游秋豫。他们认为，这是现在诸侯们应该仿效的法度啊！

见于文字较早的这条夏谚，仍带有浓厚的农业社会气息，描绘了一幅十分有趣的农业王国的图画，它对于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社会关系及风俗习惯都有着一定的意义。往后观测天气的农谚还时常出现在西周以后的《诗经》中。如：

“朝隤于西，崇朝其雨。”（《鄘风·蟋蟀》）

“上天同云，雨雪雰雰。”（《小雅·信南山》）

“有渰萋萋，兴雨祁祁。”（《小雅·大田》）

“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小雅·渐渐之石》）

第一条是以虹出现的方向来占测晴雨的谚语，第二、三条是以云占雨的谚语，第四条是以月占雨的谚语，均为我国古代农谚。

在谚语中，农谚的数量是最多的，将近占谚语总数的一

半。东汉人崔寔在他编著的《四民月令》里，第一个集中收录了二十四则农谚，已极近似现代农谚了，如“锄头三寸泽”就是今天农民常说的：“锄头上有三寸水”。南北朝时北魏的农业科学家贾勰在他撰写的《齐民要术》中选用了民间流传的农谚三十条。如：

“耕而不劳，不如作暴。”（如果耕了以后不耨，不如让它晒着不耕。）

“湿耕泽锄，不如归去。”（土壤湿烂耕作，还不如先回去。）

从以上论述我们看出，我国古代谚语确是源于农业劳动、生产斗争。气象谚、农谚是我国古代谚语的最初形式，它们以农业村社的形式作为它流传的社会基础。古谚有云：“智如禹汤，不如常耕。”劳动人民说：“即使你智慧如夏禹、商汤一样，也还不如亲自去耕种。”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我们的先人特别重视农事活动以及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乃至将它带进和转化成口头文学的形式，产生出数以万计的农谚，正是遵循了这一客观规律。

（三）

谚语，也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所以，谚语除了农谚之外，它所反映的内容越来越宽广。这些灿若繁星的谚语，简直可以说包汇万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风土人情，无所不有，巨如社会斗争，细如日常生活，一揽无余，构成了一部珍藏民间的“大百科全书”。

社会以外，无所谓谚语，谚语跟随着社会发展，它是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日益丰富和复杂起来的。作为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的关系也反映在谚语当中：